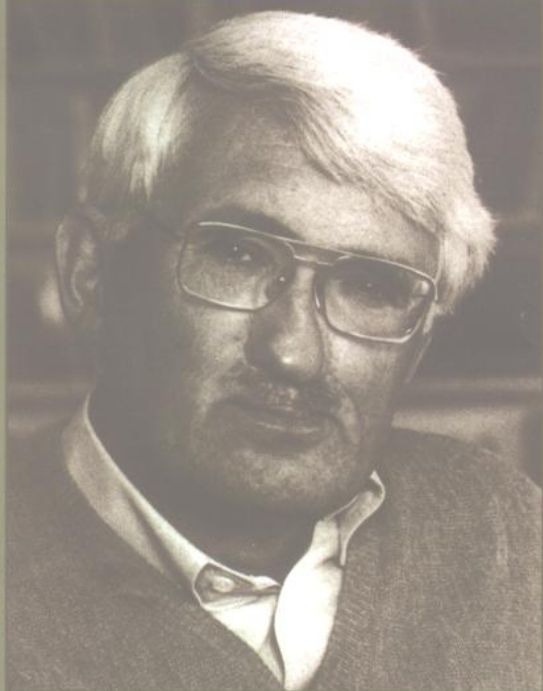


社会理论译丛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郭官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社会理论译丛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郭官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社会理论译丛)
ISBN 7-80149-405-9

I. 论… II. ①尤… ②郭… III.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集 IV. B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123 号

·社会理论译丛·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著 者: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译 者: 郭官义

责任编辑: 程晓燕

责任校对: 同 文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00 年12月第 1 版 2000 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ISBN 7-80149-405-9/B·059

定价: 22.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0-333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Jürgen Habermas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6

德国舒坎普出版社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世界范围内中文简体字翻译、出版、发行专有权。本书根据舒坎普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译 序

一、哈贝马斯的生平

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在联邦德国文化科学界崭露头角的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er Schule) 理论家。今天他仍被公认为“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历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中有着深厚的造诣, 而且还是这些学科中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是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最有成就的鼓动家”;^① 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巨大影响, 被称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② 而且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雷克斯认为, 哈贝马斯的造诣之深可与黑格尔相媲美; 彼得·威尔比 (Peter Wilby) 则直接称哈贝马斯是“当代的黑格尔”和

① 克劳斯·冯·柏伊姆著, 李黎译:《当代政治学理论》, 第 54、59 页, 商务印书馆, 1990。

② 转引自 Detlef Horster, *Habermas zur Einführung*, SOAK Verlag Honnover 1980, S. 7.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①正是由于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影响，1974年，他荣获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的黑格尔奖金；1976年，联邦德国达尔姆斯达特市德国语言和文学科学院授予他弗洛伊德科学散文奖；1980年，他荣获法兰克福阿多尔诺奖金；同年，美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称号；1981年，匈牙利科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市镇——古马斯巴赫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是一位神学院院长，父亲是当地工商联合会会长。这样一个家庭，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并不引人注目，它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态度总的说来是顺从，是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哈贝马斯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及其发动的野蛮和残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但是哈贝马斯那时对于法西斯在德国本土以及在其他许多国家犯下的累累罪行并不关心和了解。

1945年，法西斯德国投降时，哈贝马斯正好16岁。他在回忆这场经历时曾谈到：那时我从广播上听到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争贩子们的审判中，从电视上看到的揭露希特勒匪徒在集中营里的暴虐行为中，才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这场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后来的思想。^②这场经历促进了他的政治意识的萌发。他开始对法西斯的本质有了初步认识，也就是说，他开始认识到，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是一种罪恶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为德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

① 参阅 Peter Wilby, "Habermas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New Society*, vol.47, No.859, 22, March 1979, p.667.

② 参见 Interview mit Jürgen Habermas am 23.März 1979 in Sternberg, in: D.Horster, *Habermas zur Einführung*, a.a.O., S.70.

开始新的生活而兴高采烈，内心感到这一重大转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这种认识决定了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态度。

1945年法西斯的垮台，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从前被查禁和付之一炬的书籍，又重新出现在社会上。这些书籍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哈贝马斯，促使他怀着幼稚的好奇的兴趣在家乡的小镇图书馆里阅读着他能够接触到的多种书籍；他也如饥似渴地在德国共产党开办的书店里阅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①

1949年，哈贝马斯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德国文学和经济学。这年9月，阿登纳领导的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然而这个政府竟允许它的内阁成员中有坚持纳粹思想的人。这件事使哈贝马斯对这个政府是不是民主政府，以及到底能否同纳粹思想彻底决裂产生了怀疑。这件事同时也加深了他对实行社会民主和为此而进行斗争的认识。哈贝马斯当时的这种认识只不过是一种厌战的和平主义者的自发的感性认识。所以在学习哲学的初期，他总认为哲学同政治是没有相互依赖关系的。1953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只字未改地发表了他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任教时所作的报告《形而上学引论》。^② 海德格尔这一举动使哈贝马斯深为震惊。这使他开始认识到：哲学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除非哲学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多种政治事件置之不理。这是哈贝马斯反对纳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53年，哈贝马斯由苏黎士大学转入波恩大学学习。在这

① 参见 Interview mit Jürgen Habermas am 23. März 1979 in Sternberg, in: D. Horster, *Habermas zur Einführung*, a.a.O., S. 72。

② 海德格尔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1933年加入纳粹党，同年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发表过许多吹捧和效忠希特勒的演讲。

► 4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卢卡奇在书中阐述的物化理论以及其他多种观点，都使他激动不已。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阅读情况时说，罗维特（Kart Löwith）^①和卢卡奇是他学习和研究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引路人。

1955年，他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领导的“社会研究所”。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法兰克福老一辈代表人物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阐述的辩证理论，以及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所阐明的思想，使他感到新奇。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物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理论发展曾产生了推动作用。可以说，他从这个时期开始，把哲学兴趣同对实际政治兴趣结合了起来，并随之对现实政治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②

1961年，他的教授论文《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在马堡大学沃尔夫冈·阿本特欧特（W. Abendroth）^③获得了通过。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964年，哈贝马斯作为副教授执教于海德堡大学。同年下半年，他来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

① 罗维特（1897~1973），德国哲学家。自1952年执教于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他以对话体形式论述费尔巴哈、马克思、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思想。人类学的命题是他的哲学著作的基础；他否认人有什么先验的认识；他力图证明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的神学源泉是站不住脚的。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从黑格尔到尼采》、《世界史和救世史》、《从笛卡儿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和世界》。

② J. Habermas im Gespräch mit Axel Honneth, E. Knödler - Bunte und A. Widmann,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Oktober 1981, Heft 45/46, S. 127.

③ 阿本特欧特（1906~），德国法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1947~1948年在莱比锡大学执教，1951年起在联邦德国马堡大学任教授，是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著作家。他的代表作有：《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和危机》、《欧洲工人运动的社会史》、《对抗性的社会和政治民主》、《工人阶级、国家和宪法》。

1971年。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加上他经常向学生讲演，同他们一起讨论，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因而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讲堂内总是座无虚席。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了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运动初期，哈贝马斯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当‘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时，我同阿本特欧特等几位教授一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联合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一个老年战斗队。”^①但不久他就同激进的学生运动发生了分歧。其根本原因是双方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不同估计和分析。在左派学生领导人看来，工人运动的时代又到来了，革命爆发即在眼前。因此对联邦德国社会中的某些法西斯化的趋势，能够并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暴力行动。于是，学生运动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冲课堂、向教授们扔臭鸡蛋和西红柿；学生联合会还计划召开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学生会议，并在整个德国举行游行示威，直至到已由警察占领着的大学举行示威，占领大学院系和一些研究机构。尽管哈贝马斯认为，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不民主、不自由的现象，但这个社会制度总起来说是比较优越的，政治、经济形势也是稳定的。^②因此对于议会中存在的非民主现象，只能采取有说服力的分析或启蒙形式来解决，而不能使用暴力。他指责学生们的过激行动，甚至公开谴责他们是“左派法西斯

① 参见 Interview mit Jürgen Habermas am 23. März 1979 in Sternberg, in: D. Horster, *Habermas zur Einführung*, a. a. O., S. 76~77.

② 同注①，S. 75。

斯”。^① 而学生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1968年12月，左派学生夺了他的权——占领了他当时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近10天。双方冲突甚至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于1971年终于离开了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② 科学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和这个学会的学部委员。

在普朗克学会任职期间，他常因人事和行政工作中的问题同科学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尔·弗利德利希·魏茨泽克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③ 龃龉不断，于1981年4月辞去该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到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致力于他的研究工作。

1983年，他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

二、哈贝马斯的创作生涯

哈贝马斯是位多产作家。从他开始学术生涯的60年代初起，到今天的近40年里，他发表的著作有30多部。

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 60年代初到1968年他与学生运动彻底决裂；(2) 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3) 80年代初，特别是他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至今。当然，这三个阶段的界线并非一目了然；他的学术思想是相互连结和交叉发展的。

① 1979年，哈贝马斯仍然认为当时他对左派学生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但也公开承认“左派法西斯”的说法不妥当。参见同上注，S.79。

②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Max-Planck-Gesellschaft) 相当于我国的科学院。

③ 魏茨泽克，1912年生，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69年任该学会科学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是联邦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哥哥。

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抱着浓厚的政治兴趣，把哲学兴趣和对现实政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用批判的眼光揭示、分析和抨击他所看到的多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和事物。因而他这个阶段的著作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现象及其危险发展趋势的关注，他在其成名作《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中热情赞扬 17 世纪英国和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律制度和舆论制度所起的政治功能以及其所依赖的自由和理性原则，并明确指出：19 世纪下半叶以后，公众的喉舌——报纸和大众宣传工具，逐渐被少数人，被社会团体、政党，最后被国家所掌握和垄断，成了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公众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媒介物，从而也丧失了他们过去享有的一切权利。他们原来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现在被以集体利益为幌子，实际上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团体和政党所代替；原来他们手中的工具，现在倒过来成了政党的工具。公众裁决越来越成了行政裁决，并且，行政裁决对于公众来说，越来越成了看不见的东西和不能批评的东西。有时国家也把公众吸引到它的行政管理之中，但这往往只是为了达到为政权叫好的目的。劳动者能够作出的决断，是在官方经济决策机关和政治决策机关的影响下做出的。政府之所以对劳动者感兴趣，是因为政治权力的贯彻还依赖于他们的选票，其目的是加强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它们根本不理睬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性。^① 曾经具有批评权利的公众，现在成了被愚弄的公众；政党召开的群众大会也只是一种宣传活动，参加大会的群众也只能扮演一种没有报酬

① 参见哈贝马斯：《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第 242 页，德文版，1980。

的跑龙套的角色。^①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还有：《大学生与政治》、《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哈贝马斯对现实政治兴趣的相对淡薄，转向批判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并着手建立他的有别于他的前辈的理论体系——交往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交往理论为框架的社会进化理论，并且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按照当年联邦德国一些评论家的说法，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是倒退，理论上是悲观失望，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为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作论证。^②这在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中表现得甚为明显。

哈贝马斯本人却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古典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由“国家管理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这种变化，人们不应该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范畴，而应根据情况重新考虑，对它们作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他认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对待一种从某方面需要修正，但它的鼓舞人的潜力永远没有枯竭的理論的正常态度”。^③所以他在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之后指出，在这个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直接运用于生产，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实际上决定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了“第一生产力”，成了“独立的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

① 参见哈贝马斯：《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第257页，德文版，1980。

② J.Habermas im Gespräch mit Axel Honneth, E.Knödler - Bunte und A.Widmann,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Oktober 1981, Heft 45/46, S.124~125.

③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9页，德文版，1976。

源”，“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越来越不重要”，“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不存在了。”^①在此基础上，他对马克思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重新作了解释。他在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时，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也作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经济危机仍然发生，但是这种危机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加以控制；发展中所遇到的干扰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排除，还可以越过政治系统放到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加以解决。^②

他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1974）、《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动的理论》（1981），等等。

80年代后，特别是从1983年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直到1994年退休至今，可以说是他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关心人的道德意识发展和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建立，或者说，社会稳定问题，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论题。

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对话应以相互谅解（了解）为目的，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他的伙伴进行诚实对话的，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因此也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③

① 参阅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80页，德文版，1968。

② 参阅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第55页，德文版，1973。

③ 参阅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理论》，上卷，第385，387页，德文版，1981。

“相互谅解就是亲善”。^① “每个人对他人都应怀着普遍的、团结互助的责任心……团结他人即把他人视作我们中的一分子，是我们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责任。有道德的共同体，仅仅是通过铲除歧视人和给人带来痛苦的消极观念，以及把那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包容在相互关怀中建立起来的……包容他人，不是把他人融入自身，更不是排斥他人。没有差别地尊重每个人，也应该是尊重另一个国家的人或是有自身差异的不同民族的人。”^②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1983）、《现代哲学对话》（1985）、《一种清算灾难的形式》（1987）、《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追补的革命》（1990）、《作为未来的过去》（1991）、《事实与价值》（1992）、《对话伦理学解说》（1992）、《包容他人》（1996）等。

三、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的基本框架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重建》）这本书，从形式上看虽然是本论文集，而且每篇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即兴”特征，但从论述的内容的整体上看，它展现了作者的理论抱负和他要建立的理论大厦的轮廓，同时也向读者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了解、认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无疑颇有裨益。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问题

在本书的《社会学中的理论比较》一文中，哈贝马斯明确指

① 参阅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理论》，下卷，第415页。

② 见郭官义编译：《哈贝马斯新作问世》，载《哲学译丛》1997年第2期，封4。

出，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社会学中的其他理论，都不能全面解释社会进化或者提出社会进化的构思。它们都只能说明某一社会现象领域。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类的历史的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主要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其原因，在哈贝马斯看来，无疑是这种理论自身的传统中存在着问题。

作者在本书导论中明确提出，当他用交往理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时，他发现其理论传统中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第二，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规范内容时，也同时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中的内在的有用的因素；第三，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后来，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并且把它禁锢在他所确立的理论框架中。这就进一步堵死了这一理论发展的道路，使这一理论成了一种没有生机的僵死的教条。所以哈贝马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要想重新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遍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所确立的目标，就必须重建。重建不是“复辟”，不是回到已经腐朽了的最初状况上去，也不是“复兴”，不是更新那些已被抛弃了的传统，而是把这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他在本书导论的最后部分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缩手缩脚地固守纯哲学的媒介，以及为了科学的实证性全盘放弃哲学反思这两种做法，都是危险和不可行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以哲学的彻底反思力量来重建。

（二）关于社会进化的动力问题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许多篇章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进化是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过程不但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的领域中，而

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它能够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

他在使用皮亚杰（J. Piaget）的个体发生学的观点分析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时，强调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同性，强调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他认为，人在道德实践领域内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反映在世界观中，形成为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这对社会进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们一方面能把人置于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的绝对令律之下，成为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稳定性的指示器。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具有传播的能力和使制度变化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形成社会的一体化，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利用和发展。因此，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对社会进化来说，具有起搏器的功能，它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哈贝马斯还从另一个方面来强调他的上述观点。他认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个社会，只有当它把包含在人们的世界观中的认识潜力用来重新组织人的行为系统时，它才能得以进步和发展（参阅《重建》，德文版，第176页）。因此，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他批评马克思只看到生产领域内的学习过程，只强调手段和手段选择的合理性是社会进化的发动机，而没有看到人的交往行动的调解、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具有起搏器的功能。

（三）关于社会制度的生命力问题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以他的交往理论

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预测性的分析，重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本书第四部分中，他在分析论证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和现状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时，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这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他说，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如果它不依赖于它的合法性，它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住人民群众对它持有的忠诚心，就无法永久地保障它的所有成员紧紧地跟着它前进；合法性问题同时又是与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合法性问题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存在着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的社会共同具有的现象。

问题在于如何避免或者如何解决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进行剖析，指出解决的办法是，这个社会一方面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具有大众民主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必须控制住经济领域中的冲突和冲突进程中的破坏性的副作用，使其不致于危害人们的利益。这样，它就能够避免它所遇到的合法性威胁。

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这些措施就是：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依靠制定确保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政策，根据集体的需要对生产结构施加导向性的影响，修改造成不平等的种种规章制度，通过保障生活条件的制度来补救，防止和避免这里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他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因此，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

（四）对话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话这一命题的